

英大金融

MEGA FINANCE



经济结构调整最忌“一刀切”

关于经济结构调整，不是简单地降低投资比重、减少出口依赖和扩大内需能概括。要认识到，投资要讲求精准，出口对我国企业品牌塑造依然很重要，扩大消费也需有进有退，去产能更是要考虑到行业特性，考虑到我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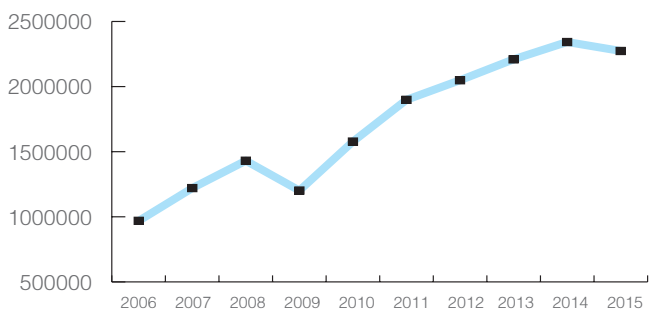
文 | 本刊记者 孔志国 李瑜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共识。但经济结构应该怎样调整？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各有怎样的着力方向？去产能要注意些什么？这些问题，依然言人人殊，尚有许多需要深入探讨的地方。为此，《英大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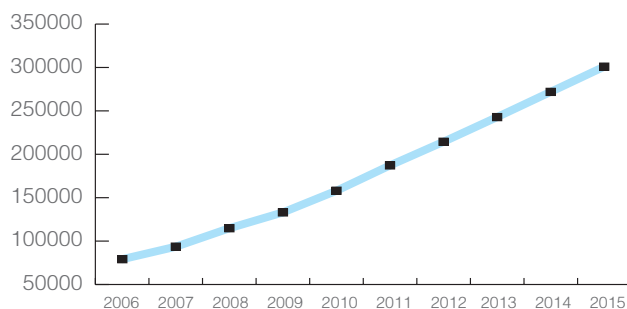
融》杂志记者专访了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黄志凌先生，深入追问与反思“经济结构调整”背后的丰富内涵。

《英大金融》：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已是社会基本共识，但关于经济结构

近十年我国出口总额 (百万美元)



近十年我国社会消费品总额 (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调整的诸多问题，大家的看法并不那么一致。例如，有些人简单认为，既然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是现有增长方式不可持续，降低投资比重，减少出口依赖，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将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黄志凌：不错，关于经济结构调整，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认识。不但关于投资、消费、出口的定位和作用，以及如何理解、做到“去产能”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加以厘清，否则可能会影响人们对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甚至会影响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的效果。

精准投资不可或缺

《英大金融》：您刚才的回答表明，您不同意降低投资比重的说法。

黄志凌：减少甚至不进行重复性投资，提高投资的精准性，可能是更准确的说法。有些地方超出实际需求建设高速公路，结果对当地经济发展拉动极其有限，但代价却是占用大量资金和土地等资源，没有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有效的投资领域中；有些地方把本该投资于农村小学和扶贫的资金挪用到处不切实际的工程中，在贫困地区建起豪华的办公楼和别墅，在缺水城市建起大型喷泉景观工程；有些地方不顾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

首席对话

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和考虑投资的地位和意义，不能为了简单地平衡数字而放弃必要的投资；也要从工业化、城乡协调发展、社会保障的现实，来规划、决定投资的强度和比重，而非完全参照发达国家的现有水平。

和国家工业布局规划，集中建设大量的钢厂和水泥厂，生产低端重复的产品，不仅扰乱了工业品市场，还造成了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类似的投资要规范、要减少、禁绝，没问题。

《英大金融》：言下之意，您认为还有些投资是必须的，主要分布在哪些领域？

黄志凌：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投资建设，道路、桥梁、机场、铁路、电力、供水、供气、供热等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但初步形成了规模恢弘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特高压电网，还带动了下游钢铁、水泥、玻璃、建材、电子等领域的发展。但需要看到，我国的基础设施缺口还很大，广大农村地区的空缺明显，支撑农村地区未来发展的必要基础设施亟待加强；有的城市存有基础设施陈旧、功能不足不全的情形，个别地方甚至基本的路桥建设基础都非常薄弱，百姓出山、过河都“难于上青天”；工业基础设施布局低水平重复建设与缺失空白并存，规划需要完善的环节、细节还相当多。这些投资需求是中国未来战略发展的重点基础，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投资的重点领域。

《英大金融》：看来一句“降低投资比重”确实过于武断了。

黄志凌：投资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据什么比



重合适，不能简单用数字来衡量。只要投资是经济社会发展、民生必需的，都是合适的；反过来，如果投资都是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不但要不得，还要出台严格的追究机制。我们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和考虑投资的地位和意义，不能为了简单地平衡数字而放弃必要的投资；也要从工业化、城乡协调发展、社会保障的现实，来规划、决定投资的强度和比重，而非完全参照发达国家的现有水平。

出口不能有意弱化

《英大金融》：显然，您同样会认为，减轻出口依赖是带有强烈的民粹心态的提法。

黄志凌：2009~2016年，8年时间，只有2012年和2014年我国的净出口GDP贡献率为负数，出口的萎靡程度可见一斑，还能怎么弱化？我觉得提弱化不如提怎么有针对性地对面对外部市场和自身竞争力结构发生的变化。

《英大金融》：外部市场和自身自身的出口优势发生了什么变化？

黄志凌：目前我国面临的出口问题，既有国际经济环境因素，更有自身竞争力问题。

所谓国际环境因素，就是因为美国、欧洲主要经济体复苏步伐缓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市场还未完全形成，我国出口的恢复和重振速度与最初预期有一定差距。

所谓自身竞争力，主要因为我们原来出口领域的“一招鲜”——劳动力成本低——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优势不再。

《英大金融》：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新优势。

黄志凌：这只是应然而非必然的事情。现在，我们只能寄望于从汇率、品牌和技术方面寻找突破口。

但是，能否做到像美国上世纪80年代那样，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强推本国货币贬值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或者像日本“安倍经济学”那样，

靠日元贬值来提高出口贡献和刺激经济，在当今国际经济背景下，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所以，通过降低人民币汇率，强化出口的空间有限。

至于品牌，可以腾挪的余地也不大。长久以来，我们的出口规模，是靠低端制造加工，付出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代价，赢得微薄的利润积累起来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生产出口国，却大部分属于贴牌生产，没有自己的世界知名服装品牌；苹果手机的各个零部件基本都在中国生产，我国的利润却只占售价的3.6%，而美国占49%，日本占35%。

美日德法的大企业品牌为什么在世界各地都吃得开，不但有市场，而且有口碑。主要是有以技术作基础的高精尖、高质量、高标准商品。所以，重振出口，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抓住技术这个牛鼻子。有了技术，就会有品牌，这样，我们的出口增速及其对GDP的贡献率不仅不会受影响，在世界分工贸易体系当中的位置也会上升一个层次。

《英大金融》：寻找新的出口竞争力优势，重振出口，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能杞人忧天，也不能因噎废食，还要对出口保持信心。

黄志凌：出口占GDP比重明显下滑，并不意味着出口地位不重要，更不能就此忽略出口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忽视其为我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如果单纯是为了美化GDP数字结构，进而忽视对出口的投入和扶持，我们将丧失未来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

出口或许一定时期内对GDP贡献不再突出，然而战略作用却始终不可替代，既是我国巩固国际经济合作、展现中国现实存在和发展实力的最有力“名片”，又是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挥自身成本和资源优势促进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直接途径，更可以在换来外汇收入的同时，促进文化输出和一定政治目标的达成。可以说，出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尤其

首席对话

出口对GDP贡献明显下滑，并不意味着出口地位不重要，更不能就此忽略出口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忽视其为我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是对开放型大国。

《英大金融》：看来出口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影响不可轻言放弃。如果能够在这段调整期，把我们国家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提上来，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矩阵，到时候再回顾，说不定会感谢出口遭遇的这段低迷期。

黄志凌：把坏事变好事，这才是干事创业的心态。何况，今天的这种处境，我们也不是毫无准备。当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我国对全球一体化的“双刃剑”特性已早有评估。只不过风暴真的来临的时候，仍然难以接受而已。

扩大消费有进有退

《英大金融》：接下来谈谈消费，消费或者等于内需，或者意味相当数量的内需。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拉动内需，但是对消费的效果有限，为什么？

黄志凌：我国处在工业化进程中，虽然国民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和积累，但尚未达到主要依靠内需、扩大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的阶段。消费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是简单的数字平衡问题，更不能通过强制消费来实现，而需要有高储蓄率的发展前提、殷实的资本积累、足够的基础设施、完善的社会保障、成熟的消费环境、健康的消费心态等等。我们必须认清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认清消费的基本规律，认识到消费的促进和兴起不是一蹴而就。

《英大金融》：就是要扩大有效消费在消费中的占比，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黄志凌：通过有效投资拉动消费。有研究表明，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之所以始于英国，得益于英国国民相对较高的识字率和算数能力，因此，为国家长远发展战略考虑，基于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消费是大方向，为此进行的科教文卫的前期投入不能荒废。

除了保证人的正常吃穿住行所需的生活性消

费外，我们要投资于扩大再生产和公共设施建设，为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创造条件，有利于提高未来消费水平和改善消费质量，要从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方面入手，增加消费的前期投入。

《英大金融》：有人认为，增强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公民福利水平是扩大消费的一种有效途径，是这样吗？

黄志凌：完善的社会保障是促进消费的重要基础，但像北欧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却不可取，不但国家财政负担很重，而且老百姓的进取动力、劳动能力会随之下降。我们要避免走高福利的道路。

产能过剩并非一无是处

《英大金融》：近年来，国家多次对产能过剩行业进行调控，特别是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传统过剩行业实行压缩，但收效不大，一些行业甚至出现产能越控越多的态势。很多人认为，产能过剩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症结所在，化解产能过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已有装备该拆除拆除，已有企业该关停关停。

黄志凌：“去产能化”不失为化解产能过剩的最直接办法，但合适与否要具体分析。

《英大金融》：也就是说，您同意产能过剩的结论？

黄志凌：从产能利用效率看，中国确实存在产能过剩现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对江苏省696家大中小企业所做的调查研究，2015年江苏省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3.89%，被调查企业中，认为目前产能利用“略有不足”和“明显不足”的分别为20.4%和29.31%以上，两者之和等于半数企业承认自己没有“满发”。从国际经验看，产能利用率高于85%为不足，在79%~83%之间为正常水平，低于75%为产能过剩。江苏省的产能过剩现象是显而易见的。考虑江苏省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

首席对话

产能过剩是周期性很强的问题，一旦不合理地“去产能化”，伤害的可能是已形成的长期经济战略优势。

排位，江苏的“产能过剩”现象应该只是全国的缩影。

但是从结构上而言，又不能完全同意产能过剩论，我国只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及发改委的数据，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的行业有：电解铝、电石、焦炭、水泥、平板玻璃、粗钢、风电设备、光伏、造船等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70%，其中电解铝、光伏两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可能低于60%。产能利用属于正常水平的行业有：煤炭、发电，产能利用率高于85%。产能利用状况最好的行业是汽车，目前产能利用率超过95%。我国工业行业产能过剩的状况是结构甚于总体，即使是严重过剩行业本身也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高端产品产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许多品种或空白，或严重不足；与此同时，低端产品产能大多严重过剩。比如玻璃，从整体看产能严重过剩，但电子用平板玻璃、玻璃基板一直依赖进口。又如，在风电设备行业，风机组成控制系统也基本依赖进口。由此看出，本轮产能过剩结构性特征较为明显。

《英大金融》：产业结构上的部分过剩，是不是您不太认同“去产能化”的根本原因？

黄志凌：妥善解决产能过剩的前提，是理性全面客观认识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经济运行周期的必然产物，买方市场一定会存在产能过剩现象，这是正常的。虽然产能过剩对经济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但一定程度的产能闲置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却具有积极功能，有助于调节和平滑需求波动，发挥类似于合理库存的调节功能。合理的产能闲置剩余，作为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一个因素，还可以推动优胜劣汰、提升消费者福利；在宏观总量周期变动过程中，库存调整也需要通过产能闲置程度变动加以实现，产能闲置可以发挥蓄水池的功能。

所以，我们应实事求是，强调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而非仅靠产能绝对值的减少；应该从有利

于我国未来战略性发展和确保经济安全出发，而非过分追求产能利用率数字而自伤元气。

《英大金融》：不过，不管怎么说，“去产能”已是当务之急，在实践中怎么操作才合适？

黄志凌：一方面是要把握原则，即数字性过剩可以接受，结构性过剩必须调整；二是要将“过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三是要使市场因素在调控和利用过剩产能方面发挥作用。

具体而言，分析、破解当前产能过剩矛盾，既要具有全球眼光，又要从动态角度看问题。

日本年产钢1.1亿吨，本国只消化6600万吨，其余产能靠出口实现。我国一些产品国际市场依存度高，从国内需求看是过剩的，但从国际市场角度看并未过剩。例如，彩电、冰箱、空调等家电的出口依存度达50%左右，电脑、DVD、皮革服装等达到80%。行业产能并未出现明显过剩倾向。

还有，1998年纺织业改革脱困时，行业普遍认为国内产能压到3000万锭比较合适，而到2000年则提出压到3400万锭，但2005年发展到7500万锭也未出现明显过剩迹象，这是因为伴随中国纺织品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国际市场容量的扩张，纺织出口已经占到当时国内产量的1/3和国际市场的1/5，国际市场需求消化了所谓“过剩”的产能。

尽管我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剩，但从发展的角度看，不少过剩产业在国际市场的增长空间依然较大。根据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最新发布的《2013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2014~2018年，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仍将位居榜首。同时，中国产业升级与进口替代需求巨大。目前在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有2/3依靠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是进口的。加快产

业升级和提升进口替代率，已经成为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在我国彻底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之前，当前“过剩”的产业还有巨大的市场增长空间。

《英大金融》：所以，“去产能化”，要明确去什么，有的不但不能去，还要大力发展；有的即使过剩，还要考虑到它的长期经济战略优势，不能操之过急。

黄志凌：所以，对于已经形成核心竞争力的产业，要保留发展，要在一段时期容忍过剩，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为未来的发展积累优势。

首先，要处理好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不能成为压缩过剩产能的操盘手，可以在制定完善专门政策法规方面积极作为，从环保、产品、工艺等角度制定行业性的强制规定，不符合规定的全部淘汰。例如，工信部出台的《钢铁行业生产经营规范条例》，设定了环保、产品质量等硬性指标，相当于为全部钢铁企业打上了“许可”或“不许可”的标签，未来淘汰产能的目标指向非常明确。

其次，还要放眼长远，将部分过剩产能作为战略性储备。产能过剩是周期性很强的问题，一旦不合理地“去产能化”，伤害的可能是已形成的长期经济战略优势。比如光伏，我们在世界上已经占据了很有力的竞争地位，目前受到外部需求减少影响，短期看是过剩，但长远考虑，不能急功近利、简单地全部淘汰；再如造船，属于战略性、支柱性产业，关系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其实是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有力抓手。

当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也很有必要。要充分依赖和利用全球消费能力，化解我们自身的产能过剩矛盾；与此同时，多手段综合并举解决过剩产能，要充分发挥产业链作用，例如，水泥厂发展水泥制品、大型水泥构件，钢铁厂发展下游钢材产品深加工等，以解决水泥过剩和钢材过剩问题。□

